

馬尼拉大屠殺與李旦出走日本的一個推測

(1603~1607) *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 由於本文涉及一些考證的工作，有時必須逕行引用原文，而本文所使用的史料，有若干條為十七世紀的英文文獻。當時單字的拼音還沒有標準化，因此有些時候看起來好像是拼錯了。不過，讀者順讀，應該還不成問題。再者，本文也多處引用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Cleveland, Ohio: The H. Clark Co., 1903 - 1909) 這套英譯的菲律賓群島史料集，但大都直接自古騰堡計畫 (<http://www.gutenberg.org/etext/>) 的電子檔引用，因此未能註明引用頁碼，特此說明，並請讀者諒察。

摘要

有關李旦的研究以岩生成一的作品最為重要，但他誤讀了一小段史料。重新解讀那個文件，我們當可推算李旦是在1607年左右從馬尼拉移住到日本。四年之前，即1603年，馬尼拉發生西班牙人大規模屠殺華人的事件，當時被殺者將近兩萬五千人，而倖存者不過才兩百人上下。他們都被處以到排櫓船擔任划槳手的酷刑。透過中國官方遲來的干涉，西班牙人終於在1606年釋放華人划槳手。李旦有可能就是這些幸運的人員之一，並且在隨後不久移居到日本長住。

關鍵詞：李旦、馬尼拉大屠殺、馬尼拉總督、福建巡撫、華人客長

歷史學家的本業，不外是釐清史實與賦予史實意義。其方法，相應於前者為考證；相應於後者為解釋。從事歷史解釋的工作，經常利用到科學的方法與行為、社會科學的理論，往往也能就塵封往事說出一番大道理。這在我們的時代幾乎是史學工作的主流。對照之下，史實考訂的工作往往就隱而不顯，未能獲得必要的重視。某些從業者甚至在還沒有理出正確的史實時，便急於提出一套說法。儘管那樣提出的說法不無參考價值，畢竟只是邏輯為真，卻不盡符合歷史事實。有些時候，史實認識不夠準確並不影響史學工作者初步的推論或解釋，然而卻也使他疏於自我檢查，而在延伸論述時犯下比較嚴重的錯誤。

意識到此，本文作者便認為經常性地檢討解釋性史學作品所描述的史實之正確性，實在有其必要。當然，費力去考訂史實，即使有了成果，往往也未必能帶來突破性的新說法。本研究的嘗試，大致就產生了這樣的局面：對細微的史實完成了一些比較可靠的修訂，但沒有辦法立即提供給讀者更多的解釋。這要請讀者多多包容，並且不吝指教。

一、李旦何時到日本？

釐清史實需要從事考證，而在推理之外，更需要證據，也就是更多的史料與更正確的解讀。本文即以岩生成一（1900 - 1988）教授有關李旦的研究作個例子。我們的目的不在責備前輩學者，而是要說明文獻的考證其實不只是排比資料，從邏輯上去檢查這樣的工作而已。有時候更需要周諮博採，發揮甚多的聯想力，才可能將草蛇灰線、蛛絲馬跡串聯出一段有頭緒、有肌理故事。

岩生成一討論李旦的文章有二，一篇是發表於1936年的〈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I）¹；另一篇為1985年發表的〈明末日本僑寓シナ貿易商一官アウグスチン李国助の活動——「明末日本僑

1 《東洋學報》，23：3（1936年5月），pp. 63 - 119。

寓支那甲必丹李旦考」補考〉（II）²。在這相隔幾乎50年當中，岩生成一還將前面的（I）文改寫為英文，於1958年發表，題為“Li Tan李旦，Chief of the Chinese Residents at Hirado, Japan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Ming Dynasty”（III）³，與日文版（I）比較，英文版（III）增加了少許資料，但沒有改變其論證與主要的內容。近年來，許賢瑤將前述（I）、（II）兩文譯為中文，先後發表於《臺北文獻》，分別題為〈明末僑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IV）⁴與〈明末僑寓日本支那貿易商一官Augustin李國助之活動——「明末僑寓日本支那甲必丹李旦考」補考——〉（V）⁵，其譯文（IV）也以「譯註」的方式，將英文版（III）補充的內容加入。（IV）與（V）兩件中譯版都收在《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一書中。⁶

雖然我們能找到的有關李旦的研究論文，至少還有蘇同炳，〈李旦與鄭芝龍〉⁷、鄭喜夫，〈李旦與顏思齊〉⁸與〈補記「李旦與顏思齊」〉⁹、童怡，〈李旦故事解〉¹⁰、毛一波，〈鄭芝龍史料中的李旦和顏思齊〉¹¹……等數篇文章，但是對於李旦的來歷之描述，以及李旦即英、荷史料、檔案中的Andrea Dittis的比定，大體上皆沒有超出岩生成一的主要發現。特別是有關李旦從馬尼拉移居日本發展的史實，目前學術界主要也還是仰賴岩生成一根據英、荷資料重建的成果。

不過，如果從西方的學術傳統來看，岩生成一還是上有所承。因為有關李旦的故事，畢竟與日本的涉外關係史緊密相關，因此有一些西方著作早已指出李旦來自西班牙人佔領的菲律賓這個事實。例如Paske-Smith在1930年出版的作品上就說：

2 《東洋學報》，62：1-4（1985年3月），pp. 63-86。

3 刊於*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17（1958），pp. 27-83。

4 《臺北文獻》，直字第128期（1999年6月），pp. 179-229。

5 《臺北文獻》，直字第131期（2000年3月），pp. 221-237。

6 見村上直次郎等著、許賢瑤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宜蘭市：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pp. 59-130及pp. 131-154。

7 收入蘇同炳，《明史偶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1995），pp. 217-240。

8 《臺灣風物》，18：1（1968），pp. 24-36。

9 《臺灣風物》，19：1-2（1969），pp. 59-64。

10 《臺南文化》，7：4（1963），p. 31。

11 《臺灣文獻》，14：1（1963），pp. 72-80。

Andrea Dittis, the Hirado China Captain, was formerly Captain of the Chinese at Manila but got into difficulties with the Spaniards, who seized all he had and sent him to the galleys. He escaped and came to Hirado.¹²

再者，在稍後出版而由Paske-Smith所編輯的一本書中，他也作了類似的敘述¹³，但皆未註明以上敘事的依據。不過，這並不是什麼秘密，因為早在1613年英國人開始與李旦接觸時，類似這樣的描述就已經被反覆述說，而在當代人John Saris（卒於1646年）¹⁴和Richard Cocks¹⁵的信函或日記中留下近似的記錄。

岩生成一很重要的一項貢獻是他找出了有關李旦從馬尼拉前往日本過程的原始資料，也就是Richard Cocks信函中的一段簡短敘述。在岩生論文（I），pp. 70 - 71提到：報導李旦到九州平戶僑居的最早文獻，正是1616年2月25日¹⁶駐居平戶的英國商館負責人Richard Cocks寄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理事會（the Court of Directors）的一封信，他使用日文引錄了信函的內容如下：

アンドレア・ディッチスはフィリッピンのマニラに於ける支那人の渠頭なりき。而してイスパニア人は、四百貫目以上の價值ある其の所有品全部を獲ん為めに争鬪を始めて、彼をガレオン船内に留置せり。其の後九年にして彼は同船を脱出して、平戸に來り、邇來引續きて同地に居住せり。

12 M. Paske-Smith, *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1968; Kobe, 1930), pp. 27 - 28.

13 Peter Pratt, *History of Japan, Compiled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t the Instance of the Court of Directors* (Kobe, Japan: J.L. Thompson, 1931), vol. I, p. 54.

14 Sir Ernest M. Satow ed., *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00), p. 88.

15 Richard Cocks的日記有不同的版本，本文使用的版本為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原文編》（東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1978），共三冊。英文標題為 *Diary Kept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Diary of Richard Cocks, 1615 - 1622*.

16 當時英國使用舊曆（Julian calendar），比新曆（Gregorian calendar）晚十天。

岩生成一註出了這段文字的來源為他本人所編譯的《慶元イギリス書翰》¹⁷一書。該書pp. 516 - 548為Richard Cocks於1616年舊曆2月25日（新曆1616年3月7日）自平戶發出給英國東印度公司理事會的書信。上一段引文出現在p. 535。兩段文字有幾個字有所出入，但都不影響其內容。許賢瑤自日文版逕譯的中文版（岩生論文（IV），p. 67）作如下表述：

Andrea Dittis 乃菲律賓馬尼拉之支那人的首領。而西班牙人為了取得其所具有之價值四百貫目以上之所有貨品而展開了爭鬥，將他拘留於galeyen船內。九年後，他逃離該船，來到平戶，以後一直居住於該地。

「四百貫目」即40,000兩銀子。除了未將日文漢字改成中文之外，許賢瑤的譯文大體上可稱正確傳述了岩生成一的文意。岩生成一原文的意思指李旦在被送進排櫓船（galley）¹⁸充當划櫓苦役之後九年，才逃離該船，前往日本。果然如此，到底李旦是在那一年到達日本，也就無法推斷了——因為我們既不知道他在那一年被送進排櫓船服役，也不知道在1616年時他已經旅居日本多少年了。

《慶元イギリス書翰》沒有提供該書信之英文原文，但岩生成一在1958年的英文版（岩生論文（III），p. 35）中引錄了Richard Cocks書信原文的相關文字如下：

Andrea Dittis was governor of the Chinas at Manila in the Philippine and in the end the Spaniards picked a quarrel

17 岩生成一譯，《慶元イギリス書翰》（東京市：駿南社，1929）。

18 在上一段引文當中，岩生成一似乎沒有分清楚galleon與galley的差別，而將“galley”譯成「ガレオン」，這是不恰當的。至於許賢瑤的譯文為何會把相關的那個字拼成“galeyen”，與岩生論文日文版（i）及英文版（III）皆不一致，應該是他採用了荷蘭文“galley”的複數形！然而Richard Cocks的原信本為英文，岩生成一的文章則為日文或英文，實在沒有理由在譯成中文時使用荷蘭文來表示。“Galley”為一種主要靠划櫓來推進的歐洲古代船舶，可譯為「排櫓船」，多數場合皆用於作戰。1571年地中海「拉班圖之役」（the Battle of Lepanto）及1588年英國在英吉利海峽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後，此一形式的船舶基本上退出歐洲的海戰。不過，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群島一帶仍然繼續使用它作為主要的戰艦。

on purpose to seize all he had, to the value of above 40,000 taels and put him into the galleys, from whence he escaped some 9 years since and came to Firando, where he hath lived ever since.

這回岩生成一明確地註明出處為William Foster, *Letters Received b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from its Servants in the East*, vol. IV (London, 1900), p. 51。個人一時未能在圖書館找到William Foster所編輯的這套史料，因此追蹤史源的工作也就暫時在此打住。

不過，針對岩生成一所摘錄的Richard Cocks這段書信的內容，個人對“from whence he escaped some 9 years since and came to Firando, where he hath lived ever since.”一句該如何理解，頗感不安。我懷疑：這段文字的意思會不會是說李旦在九年前抵達日本呢？如果是，我們不就可以推斷他是在1607年左右開始到平戶居住的嗎？

有關李旦自馬尼拉前往日本居留的敘述，岩生成一的（I）、（III）兩文，依據的是已經被William Foster編輯過的史料，而《慶元イギリス書翰》的資料也來自William Foster的書。1929年《慶元イギリス書翰》出版後，岩生成一本人在1930年前往歐洲從事研究，更在1931年秋至1932年春旅居英國倫敦，閱讀並抄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資料及原始檔案。從史料的價值來看，他在這段期間所抄錄到的資料更加接近史源，更值得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岩生成一離臺返日，而他在英國所抄錄的資料，經過曹永和、賴永祥等人的轉抄、整理與周學普的翻譯，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1959年出版成《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¹⁹一書。其p. 21譯文云：

1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岩生成一抄輯、周學普譯，《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57種，1959）。

經理Cook從Firando上董事會之函件，

1615年2月25日至1616年²⁰

此中國人兄弟Andrea Dittis及Whaw乃大商人，將能比所有之日本人繼續運更多之商品來此地也。其中一人曾在菲律賓之馬尼刺為華僑之領袖（Governor）；後來西班牙人與渠發生爭執，奪取其一切財物，價值達40,000兩之多，且將渠送入Gallies監獄。渠在約九年前從該處逃至Firando（平戶），即長住此地。

《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p. 127收錄英文原文為：

Agent Cock to the Court, Firando 25th Feb. 1615-16.

These two Chinese brothers, Andrea Dittis and Whaw, are great Merchants ; & will contyn[ue to take more] Merchandize in this place than all the Japanese. In f[ine]²¹ he formerly wa]s Governor of the Chinese at Manilla in the [Phillipines ; &] in the end, the Spaniards picked a quarrel on [seized] all he had, to the value of 40,000 Tais ; [sending him] into the Gallies ; from whence he escaped some nine Years [past], and came to Firando ; where he hath lived ever since.

以上《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的資料係抄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Factory Records : China and Japan系列²²，雖然不是Richard Cocks書信的原件，可是那是在1616年左右就抄錄的，真實性不容置

20 應作1616年2月25日。當時英國人將January-March仍記為上一年（1615）的年分；3月25日以後才記作新（1616）的一年。實際上此處之2月25日已經屬於我們一般所稱的1616年。參考Peter Pratt, *History of Japan*, vol. I, p. 51, note 3 : “England adopted the Gregorian Calender in 1752, when the 1st January was establish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instead of lady day, March 25.”

21 按、“in fine”是「結局」、「總之」之意。

22 參考J. D. Pearson ed., *A Guide to Manuscripts and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Isles relating to the Far East*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7 - 38.

疑；而文字雖然與William Foster所收錄的Richard Cocks原信有少許出入，但內容差別並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周學普的翻譯正作「渠在約九年前從該處逃至Firando（平戶，Hirado），即長住此地。」與本文所推測的李旦是於1607年左右從馬尼拉前往日本的情況相合。

最近鮑曉鷗先生剛剛完成並出版《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 - 1642》一書。該書也談到李旦的馬尼拉經歷如下：

寇克敘述了李旦早年的生活，說他少年時為了致富而去到馬尼拉，在當地漢人中居於一定程度的領導地位，但在1607到1608年之間，西班牙當局向李旦要求他手頭的4萬里爾（*real*），於是雙方之間起了一些爭執，最後李旦被送上了槳帆船，不過他設法逃脫並去到平戶，成了平戶港漢人社區的領袖。²³

鮑曉鷗自註其依據為Richard Cocks於1616年2月25日發出的書信，與岩生論文（III）所稱的出處²⁴完全相同。不過，在據以敘事時，鮑曉鷗顯然作了一些與史源不一致或者根本沒有史源的敘述，而且還將銀錢單位由「兩」改為「里耳」（「里耳」小於「兩」，約當後者之72%而已。），稍微有所缺失；但他也主張李旦到日本的時間是「1607年到1608年之間」，則顯然與Richard Cocks的原意仍相吻合！

如上所述，從各方面看來，李旦到達日本的時間應該是1607年前後沒錯，而岩生成一弄錯了！他解讀那一句英文，讀錯了。岩生讀錯那一句話，由於影響看起來並不大，因此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可能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就算是周學普早在1959年就已正確地譯出李旦是在1616年之九年前遷入日本居住，讀者很容易去推斷那個時間點是在1607年前後，到底還是沒有人指出岩生成一的錯誤。

其實，Richard Cocks信件內容所描述的李旦原本在馬尼拉居於華人領袖地位、他曾經與西班牙人發生衝突、他在馬尼拉居住與活動期間

23 鮑曉鷗著、Nakao Eki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 - 1642》（臺北市：南天書局，2009），p. 236。

24 William Foster, *Letters Received b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from Its Servants in the East* (London, 1900), vol. IV, p. 54.

曾經擁有過40,000兩銀子的財產、西班牙人掠奪了他的財產並且把他送到排櫓船裏當划槳苦役……這些有關李旦離開馬尼拉前之處境的描述，在翻譯及理解上並不困難，學者之間也沒有爭議，可是不知何故，還是沒有人從馬尼拉方面去進一步追溯李旦早期的經歷與離開馬尼拉的真實原因。這倒是令人費解。

二、李旦與馬尼拉大屠殺事件的關係

針對1616年2月25日Richard Cocks信件所描述的李旦在馬尼拉的遭遇，熟悉早期西班牙殖民菲律賓歷史的學者應該不難聯想到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這件事情。問題是：有人在那次大屠殺中存活下來嗎？如果有，而且李旦恰巧是倖存者當中的一員，那麼他是否可能待到四年之後，才在1607年左右從馬尼拉去到平戶呢？（為什麼要等四年呢？）

完全直接的證據雖然沒有，但存在著這樣的一個事實的可能性極高。以下將從三個方面來舉證、推理，以說明如下事實：（1）1603年的馬尼拉大屠殺事件發生之後，有少數華人僥倖逃過一劫，也確實被送到排櫓船（galleys）中當划槳手。（2）由於某些緣故，有關該事件的訊息雖然很快就傳到中國，但中國官方反應緩慢；等到中國方面向馬尼拉當局索回財物與人員時，又被西班牙總督拖延，因此人員被釋放的時間，大約在1606年6月以後。如果李旦是被釋放的大屠殺的倖存者之一，而且打算由馬尼拉移居到日本平戶，最快是趕上當年的西南季風期揚帆北上，否則就得等到次年夏天，總共經過四年的時間差，正好與1607年左右的說法吻合。（3）李旦自稱他是馬尼拉華人的頭目，西班牙人因為覬覦他的財產才將他送入排櫓船當划槳手。此一敘述多少係屬他自我標榜的說法，但換個角度來看，也不能說是完全背離事實。

有關1603年西班牙人屠殺馬尼拉華人的事件，以下幾個主要的研

究與作品頗值得參考：

- （1）張維華，〈明季西班牙在呂宋與中國之關係〉，原刊於《禹貢半月刊》第六卷第八、九期合刊（1937年1月），pp. 71 - 86；收入於包遵彭主編，「明史論叢」第七冊《明代國際關係》（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68），pp. 89 - 108。²⁵
- （2）和田正廣，〈福建稅監高案の海外私貿易〉，收在川勝守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生産と流通の歴史社會學的研究》（福岡市：中國書店，1991），pp. 298 - 322。
- （3）Jose Eugenio Borao Mateo, “The Massacre of 1603` : Chinese Perception of the Spaniards in the Philippines, ” *Itinerario*, 23 (1998), pp. 22-39.
- （4）張彬村，〈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後果〉，收在朱德蘭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pp. 295 - 326。
- （5）鄭佩宜，〈1603年菲島大屠殺與晚明中菲貿易〉，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1月。

至於直接涉入此一事件的馬尼拉總督Pedro de Acuña、馬尼拉大主教當選人（Archbishop elect）Fray Benavides de Miguel, O. P.²⁶……等重要的西班牙人士對這件事都有即時的報導，現在都收入Blair與Robertson兩人所編輯的 *The Philippine Islands*，第十二、十三兩冊。此外，有關中國官方追究此事的善後問題的文件，則收集在

25 該文pp. 100 - 104處理1603年大屠殺事件。

26 Miguel de Benavides曾於1590年與另一名教士前往福建漳州，意圖傳教，結果被中國官府拘禁於海澄監獄，次年方為一名兩度到過馬尼拉的富裕華商救出，返回馬尼拉。基於當時天主教會的理念，他對某些華人的禮俗十分痛恨。參考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1963），pp. 74 - 75、*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XX, pp. 247 - 249，以及與1603年事件相關的文獻。1603年時，Miguel de Benavides的身分為大主教當選人，稍後不久就真除了。Benavides de Miguel會一些中文，但顯然不夠好。在*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I, 1603年7月5日的書信中，Miguel de Benavides他自己就說到會中文，而且在中國待過近半年之久。不知道他是否是在1590年被拘禁於海澄時學會中文？他曾經一度返回西班牙，並於1595年12月23日將高母羨（Juan Cobo）所譯的《明心寶鑑》一書呈獻給國王菲利浦二世。參考張鎰，《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河南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3），p. 206。

同一套書的第十四冊。再者，該第十四冊還收錄了一本1606年，在西班牙塞維爾（Seville）印刷出版的一本小冊子（pamphlet），英譯題為：“The Sangley²⁷ Insurrection of 1603”，據說係一名當時在場參戰的西班牙軍人（soldier）所著，經由一位名叫Miguel Rodriguez Maldonado的人編輯、摘要而成者。²⁸雖然這本小冊子處處充滿著為西班牙人殘忍行為辯護的言論，但不經意而帶出的事實描述，還是具有參考價值。另外，還有一位Antonio de Morga，他雖然於事件發生以後一、兩年才來到馬尼拉擔任副總督，但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對該事件的記憶都還很鮮明，能提供相關的訊息，而且因為他具有高官的身分，當然也不難看到相關的文件。Antonio de Morga在公餘之暇，著手編寫菲律賓群島史，1609年在墨西哥出版，書名是*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菲律賓群島事件史》），書中也敘述了相關史事。該書有多種英譯本，其中一種也收在*The Philippine Islands*，作為第十五和十六兩冊；此外，在C. R. Boxer的建議下，英國的Hakluyt Society也敦請J. S. Cummins重譯一次，在1971年時由英國的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行。中文資料則散見於《明實錄》及官員、文人的題奏與著述。以下便依據這些資料鋪排、論證。

（一）1603年大屠殺的倖存者

事件的經過始末，前面所提到的作品與文獻言之已詳。於此稍作摘述如下，以提供讀者一個簡單的背景：明神宗萬曆（1573 - 1620）中期，派出內官太監四出徵稅、開礦。高案也在1599年入閩。1602年，有一位在馬尼拉工作、名字叫作張嶷的華人，透過一位在北京當官的羽

27 “Sangley”為馬尼拉西班牙人對長住當地的華人的稱呼，一般的看法都認為源自中文，而有「生理」、「常來」等種種說法。參考李毓中，《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1》（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p. 118，註8；明朝的官方文件曾寫作「差來」，見李毓中同書，p. 156，註1。另可參考A. Cense, “Sanggalea, An Old Word for ‘Chinese’ in South Celebes,” *Bijdragen tot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no. 111: 1 (1955), pp. 107 - 108; C. R. Boxer, “A Late Sixteenth Century Manila Ms. (Plates III-VI)”,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parts 1-2 (1950), p. 43;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p. 260.

28 Blair and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V, pp. 119 - 139.

林左衛百戶閩應隆（一作「閩應龍」）向皇帝報告說：呂宋的機易山（Cavite，在呂宋島馬尼拉灣，距離馬尼拉城不遠）產黃金，可派人前往開採。²⁹朝中大臣雖然意見不一，但是宦官一派還是佔了上風。高宗於是派了一名手下（姓名不詳）、海澄縣縣丞王時和以及一名百戶干一成三個人，在1603年前往馬尼拉辦事。馬尼拉方面的西班牙當局雖然小心應付，讓這幾個人知難而退，空手回中國覆命。但是這件事情已經在菲律賓群島的西班牙人社群中引起強烈的不安，深恐中國方面派兵來襲，而與在地的華人裏應外合。於是，就在1603年10月3日，西班牙人以華人集結意圖作亂為由，爆發了大規模屠殺華人的事件。據張燮《東西洋考》所言，中國人被殺的有兩萬五千人，只有三百人沒有被殺死。³⁰西班牙人的資料提供另一個較小的數字，說是存活者只有兩百人！³¹

華人被無情屠殺的事實，有Antonio de Morga以下的文字可證。1603年10月20日，西班牙總督Pedro de Acuña派Captain Sergeant-major Cristobal de Axqueta Menchaca追殺所有的華人，前後費時二十日：

由於他是如此機靈，因此幾乎不費一兵一卒，他就找尋到在聖巴勃羅（San Pablo）與八打雁（Batangas）紮營的華人，而在接下來的戰鬥中把他們剷除盡淨。除了被生擒的200名外，其他無一倖免。這些（倖存者）被帶到馬尼拉，送進排櫓船（galleys）中服役。³²

只有200名華人活下來，送到馬尼拉，命令他們在排櫓船

29 趙世卿，〈九卿機易山開採疏（請罷福建開採）〉，收於《皇明經世文編》卷411（臺北市：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64），第25冊，pp. 338 - 341。

30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五，〈呂宋〉條，p. 92：「計捐二萬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

31 若據1606年Serville出版的小冊子所言，則存活的人數被估計得比較高，說是達到800人之譜。

32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V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25.

(galleys) 上當划槳手。李旦很有可能就是這200人當中的一員。

(二) 福建與馬尼拉的雙邊交涉

據1606年的小冊子，1603年12月10日（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Captain Marcos de la Cueva 被派往中國，說是要向駐在廣州的總督太監（the eunuch who is the viceroy at Canton）解釋此次大屠殺的緣由。馬尼拉當局是受先前福建太監高案派人前來尋找黃金的影響，錯將太監當成是最高的地方長官，更把高案的駐地當成是廣州。Captain Cueva隨行帶了140個西班牙人和兩名修士（friars）——前者大概是軍人，而後者應該是充當翻譯。Captain Cueva沒有立即出發，而在他出發之後，遭遇大風，飄回港內，座船漏水。經過一番整補，稍後他才再次出發，這回帶了150名精挑細選的軍人（one hundred and fifty picked soldiers）。Captain Cueva到了那個「葡萄牙人與中國人貿易的商站」（the trading-post where there are Portuguese who trade with the Chinese），其實也就是澳門，交給當地葡萄牙人一些信件，要他們轉交給那位太監（高案）。Captain Cueva在澳門待了一小段時間，沒有得到任何答覆，就逕自返回馬尼拉。這件事在1605年馬尼拉總督Pedro de Acuña致福建巡撫等人的信中也簡略地提到。令人好奇的是：Captain Cueva為何前往澳門，而非前往廣州或福州投遞信件？推想這大概和他帶著150名「精挑細選的戰士」一樣，顯然是無法預知中國官方的態度，深怕中國官方向他們報復，因此迴避與中國當局直接面對面的景況。結果，非常可能中國官方根本沒有收到信。1606年的小冊子就是如此說的，而總督Acuña在1605年的信中也證實了這點。

對1603年10月間菲律賓西班牙人的殘酷行為，中國方面的反應相當遲鈍。雖然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初，大屠殺的消息已經完全證實³³，可是福建的地方大吏差不多要等到當年下半年，乃至於年底才

33 李光縉《景璧集》（揚州市：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卷十四，14/85b - 87b（pp. 2410 - 2414），〈柯烈婦傳〉：「訃初聞，與難之家疑信相半，但私相駭聞而已。今年甲辰（1604）有自海上至，傳其事，安平巷哭相聞。」

有動作。³⁴要解釋中國官方行動的消極，我們很容易就可以這樣說：雖然這完全是因為張嶷、閩應隆等人的貪婪所引起的，但歸根究底，作為執行者的收稅太監高案貪功冒失自然不在話下，因此他當然不會積極地去追討公道。至於福建的地方官長，懾於太監的威勢，大概也不敢採取太強烈的動作。³⁵

不過，實際的情形應該還要複雜一些。除了澳門葡萄牙人可能沒有代轉信件之外，福建官場方面正好也出現乏人當家作主的尷尬狀態。據吳廷燮所編輯的《明督撫年表》，朱運昌於萬曆二十九至三十年為福建巡撫，三十一年為王恩民，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為徐學聚。³⁶不過，吳廷燮的年表只指出一個大概。實際上，原任巡撫朱運昌一直到三十一年八月（1603年9月5日至10月4日）都還在職，過了一小陣子方才病逝。³⁷據《明實錄》，則北京方面也要到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十五日，1603年12月17日）這一天才記錄發佈「王恩民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³⁸，發佈後通常要花上一段時間才會到任。因此，透過其他管道，馬尼拉華人被西班牙人屠殺的消息傳回福建時，福建省正好處在巡撫出缺的狀態。稍後，王恩民可能有到任³⁹，但接任的時間

34 《東西洋考》的作者張燮參與編纂、崇禎六年（1633）原刊的《海澄縣志》提到消息到達時，縣令姚芝蘭特別舉辦一個「孟蘭盆會」以超渡亡者；他也協助家屬前往呂宋取回死者之遺骨。見張彬村，〈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後果〉，收在朱德蘭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p. 317；梁兆陽，《（崇禎）海澄縣志》（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14/10a；19/1b。但是縣令的層級低，至多也只能做些撫恤遺族的工作；因此涉外之事仍有待巡撫、巡按等大員處置。

35 張彬村引用何喬遠的言論，說是福建及廣東的官僚因為害怕要負責任，所以不敢把慘案向朝廷報告。見張彬村，〈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p. 313，註38；何喬遠，《閩書》（臺南柳營：莊嚴文化，1996），卷一百四十六，146/19b（205/640），〈呂宋〉條原文云：「至（萬曆）三十六年，盡殺我人之貨其國者，閩、廣二省不敢以聞。」原文的「三十六年」為「三十一年」之訛。

36 吳廷燮撰、魏連科點校，《明督撫年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2），下冊，pp. 511 - 512。參考何喬遠，《閩書》，卷四十五，45/17b - 18a（pp. 205/99 - 100）。

37 據沈有容的自傳〈仗劍錄〉，收在姚永森，〈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集刊》，1986年第4期（1987年2月），p. 89。

38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三百九十，p. 7344。

39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五四八，萬曆四十四年八月的記錄提到「原任福建巡撫右副都御史王恩民」，顯然他的確曾經到任。參考該書，p. 10380。

極短，很快地福建巡撫又出缺。⁴⁰甚至於更不巧的是，另外一位地方要員福建巡按也同時出缺。《明神宗實錄》卷四四〇，福建巡撫徐學聚在解職候代期間，上疏指控太監高案，臚舉其罪狀之大者，奏疏中就指出：「三十二年，以撫、按並缺……。」⁴¹準確一點地說，「撫、按並缺」指的是萬曆三十二年上半年的某個時間點。⁴²《明神宗實錄》卷三九六，「萬曆三十二年五月戊寅」條下，記錄了稍早幾天，徐學聚以福建布政使的身分上疏，敘及「地方之事……綏輯消弭，其責全屬巡撫。今該省缺撫，乞一年餘。閩地何地？此時何時？可令缺官如此？」這一天得旨：「巡撫作速推來！」⁴³經過會推，結果出線的人正是徐學聚本人。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乙亥（二十六日，1604年9月21日），正式發佈「以福建左布政使徐學聚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地方」。⁴⁴他人就在福建境內，因此短時間內就可以接任。不過，即便如此，距離1603年10月的馬尼拉大屠殺事件，也已經過了一整年了。⁴⁵

依以上證據推斷，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上半年間，即使葡萄牙人轉交Captain Cueva帶來的信件，福建當局大概也沒有巡撫可以

40 沈有容當時在福建任職，但他在〈仗劍錄〉中提到「朱公逝」後，接著便言「新撫徐公」，完全沒有片言隻字及於王恩民。見姚永森，〈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p. 89。據下註，徐學聚在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前說到福建「缺撫，乞一年餘」，則顯得誇張。因為假定朱運昌卒於三十一年九月，到三十二年五月也還不到一年，而這中間王恩民極可能還到職過幾天！

41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p. 8362。

42 巡按御史出缺的時間，應該指何淳之去職到方元彥接任之間的一段期間。參考何喬遠，《閩書》，卷四十五，45/42b（p. 205/112）。據實錄，方元彥奉差的日期為萬曆三十一年九月戊申，但同年九月並無戊申日。而該記載之前一日為丁卯，因此顯然「戊申」係「戊辰」之訛。是日為九月十五日，1603年10月19日。見《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三百八十八，p. 7300。自奉差到就任，往往耗時數月，因此萬曆三十二年年年初的確沒有巡按。從黃鳳翔，〈靖海碑〉一文可知，方元彥為（山東）臨清人，至遲到萬曆三十二年夏天（1604年8月左右），他已經在任了。見《閩海贈言》（臺北：方氏慎思堂景印本，1956），卷一，17b。

43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p. 7458。

44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三九八，p. 7486。

45 附帶一言：《明史》卷三二三，〈琉球傳〉在敘述夏子陽等奉派冊封琉球國王時提到「改命給事中夏子陽，以三十一年二月抵福建。按臣方元彥復以海上多事，警報頻仍，會巡撫徐學聚疏請仍遣武臣。子陽、〔王〕士禎則以屬國言不可爽，使臣義當有終，乞堅成命慰遠人。」似乎徐學聚在萬曆三十一年初已任福建巡撫。《明神宗實錄》亦記載同一件事情，但敘事比較完整。據該書，卷四一一，夏子陽與王士禎入閩是在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但巡撫徐學聚是在三十三年三月才偕同巡按方元彥上請，因此徐學聚確實不會在萬曆三十一年初已任職為福建巡撫。請比較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新校本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p. 8369與《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p. 7679兩者敘事之差異。

作主。無論如何，福建當局要等到朱運昌、王恩民的繼任者徐學聚接任後才處理。

《明史》卷三二三〈呂宋傳〉稱將這件事向皇帝報告的人就是徐學聚等人。得到報告後，「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明神宗實錄》，卷四百〇三，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丁亥日（十一日，1604年12月31日）條云：

兵部覆福建巡撫徐學聚等奏：紅番闖入內洋，宜設法驅回，以清海徼。勾引奸民潘秀、張巖等均應究處。⁴⁶上曰：紅毛番無因忽來，狡偽叵測。着嚴行拒回；呂宋也，着嚴加曉諭，毋聽奸徒煽惑擾害商民。潘秀等依律究處。⁴⁷

兵部「議上」後，皇帝作出指示。於是，徐學聚等才「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⁴⁸

就這樣，事件發生約一年半之後，馬尼拉總督才收到三封來自中國的文件，內容大同小異。分別由福建巡按、巡撫以及收稅太監發出。巡按御史湯兆京⁴⁹署名的函件，發信日期為萬曆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1605年3月30日）；太監高霖的函件日期為同年同月的十六日（1605年4月3日）；巡撫徐學聚的函件，發信日期記為同年同月的二十二日

46 所謂「紅番闖入內洋」事件指的是1604年下半年荷蘭艦隊由韋麻郎（Wijbradt van Waerwijk）率領，佔領澎湖，謀求中國開放港口與該國通商一事。潘秀是荷蘭人雇用的人員之一。該事件最後以沈有容「諭退紅毛番」作結。

47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p. 7536。下條將「議上」的時間繫於三十二年十二月（1605年1月19日-2月17日），應依本條《實錄》所載，時間點稍微挪前至十一月。

48 《新校本明史》，p. 8373。

49 何喬遠，《聞書》，卷之四十五，45/42b（205/112），簡單介紹湯兆京如下：「桐城人，萬曆壬辰（1593）進士，好善愛民。方入閩，按治不法，風裁凜然。」。

（1605年4月9日）。⁵⁰

馬尼拉當局當然不敢不正視此事，而福建官方的來函也就被譯為西班牙文。在Blair與Robertson所編的*The Philippine Islands*第十三冊中，就收錄了當中一函，並且轉譯為英文。⁵¹另外，J. S. Cummins的英譯本Morga的*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也收錄了同一信件。⁵²據此兩種英譯本，押署的官銜為“Inspector-general of Chincheo”，這顯然是當時西班牙人給「福建巡按御史」的譯稱。換言之，西班牙人翻譯來看的正是日期押得最早、由福建巡按御史湯北京署名的那份函件。

這幾份中文函件的原稿下落如何，無從追索。不過，西班牙文獻說巡撫、巡按與太監所送來的三封信函，內容一致。事有湊巧，福建巡撫徐學聚的那件的部份內容，也因為被抄錄在他本人後來上呈皇帝的奏疏當中，從而得以保留下來，我們也轉抄如下：

我高皇帝總一方夏，表則千古，禮樂威信，世守如一。迨我今上皇帝陛下，允奮天綱，該覽八紘，北極沙漠，南及爾等東南諸夷

50 收在*The Philippine Islands*的Morga書譯本原註：“This letter occupies folios 113b-115a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Morga. We have already presented that document in our VOL. XIII, p. 287, which is translated from a copy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The answer of Acuña to this letter will be found in VOL. XIV, in the second document of that volume.”J. S. Cummins的譯本卻說總督收到三封信，分別來自福建省（Chincheo province）的都堂（Tuton）、海道（Haytao）與巡按（Inspector-general），見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 227。都堂即巡撫，見梁章鉅，《稱謂錄》（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p. 374。所以依據J. S. Cummins的譯本，來信者當中多了海道、少了太監。但從Cummins所譯出的福州當局來信的內容，實際上可以看出具名來信者正是巡撫、巡按與太監三人。再者，據馬尼拉大主教Miquel de Benavides, O.P.的文件（*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V），除總督Acuña收到一份外，他也收到一份。再據1606年出版的“The Sangley Insurrection of 1603”小冊子所言，隨著1605年的來船，太監（高案）送來了三封信，一致總督、一致總辦事處（Audiencia），一致大主教。此一作品顯然認為馬尼拉方面的收件人有三個，但福建方面的發信者則只有一個。又，箭內健次將“Audiencia”譯作「總務廳」，本文暫譯作「總辦事處」。參考箭內健次，〈マニラの所謂パリアンに就いて〉，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五輯（1938），p. 217。

51 見*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II, pp. 287 - 291。同一文件之西班牙文的當時譯本，收在李毓中，《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1》，pp. 453 - 457；李毓中的中文回譯本見同書，pp. 458 - 462。

52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p. 228 - 230。

所有之海。日照月臨，共成正朔。

如日本諸島，犯我屬國，朝廷三遣吏兵，屠潁釜山，恢復朝鮮，還諸其王以守宗廟。

鬼方楊酋，不畏王章，奪父、賊弟、棄妻，擅殺其民。南檄吏士，驅兵進縛。千里之國，夷宗翦土，鞠為茂草。非爾等所耳而目之者乎？

去年海外姦民張嶷，妄稱爾呂宋機易山有礦金可採。有司覆聞，皇帝以為驚擾海邦，貽爾憂戚，遂付法曹，斬之西市，傳首海上，以告姦宄。

乃聞張嶷去後，爾呂宋部落無故殺我漳泉商賈者至萬餘人。有司各愛其民，憤怒上請，欲假沿海將士，加兵蕩滅，如播州例。且謂呂宋本一荒島，魑魅龍蛇之區。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貨轉販，外通各洋，市易諸夷，十數年來，致成大會。亦由我壓冬之民，教其耕藝，治其城舍，遂為隩區，甲諸海國。此輩何負于爾，有何深仇？遂至戕殺萬人？蠻夷無行，負義如此，曷逭天誅？堅乞再三。皇帝以呂宋久相商賈，不殊吾民，不忍加誅。又海外爭鬥，未知禍首；又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遊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反以勞師。終不聽有司言。爰降旨，特行令所在，遣使傳諭爾等酋長部落，令咸改悔，畏天守善。其海外戕殺，姑不窮治。爾等當思皇帝浩蕩之恩，中國仁義之大。張嶷一誑口，輒不憚梟示以謝爾等。爾等非木石，獨不思灑濯其心，以報中國乎？若前事訛傳，未有兵革，投款效順，商舶往來，交易如故。若果有嫌恨，已相讎殺，可將該島所有漳泉遺民子孫追斂、各夷劫去貨財贄送還郡。自此商舶交易仍聽往來如故。其或聽信姦徒煽惑，執悖貪保，昏迷不共，恃遠抗拒，不聽贄還，即當斷絕海舶，不得西行。仍聽諸吏兵同其家，願報讎者，一風張颿，千艘竝出。鄉音難辨，玉石俱焚。或復聽各貢市諸國二百年忠順者，許其部落驅兵合勦，即以呂宋賜為市舶提舉。有司再請，天怒且

及，一旅僅賴。釜山、播州，白骨在望，能不噬臍？故茲檄諭主者施行。⁵³

廣東當局的三位大官的信函中雖然有一些威脅攻擊西班牙人的菲律賓群島的字眼（如云如果不接受中國方面的要求，將「仍聽諸吏兵同其家，願報讎者，一風張颿，千艘竝出。鄉音難辨，玉石俱焚。」），實際上先自行批評中國商人的不是，給自己立了臺階；又說明皇帝如何善體人意。總之，迂迴表明中國方面不會出兵報復，只要求馬尼拉當局「將該島所有漳泉遺民子孫追斂、各夷劫去貨財貨送還郡」，便讓福建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持續下去。

不過，當時的西班牙人還是相當緊張，尤其是馬尼拉大主教（Archbishop of Manila）Benavides de Miguel。他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也收到同樣的三封信。他認為勢態嚴重，必需審慎處理。於是他先後在1605年6月10日及13日兩天，向馬尼拉政府總辦事處（Audiencia）及評議會（Chancilleria）提出備忘錄，說明中國官方要求返還其人民及財物，陳述他的意見，主張財物一定要儘速歸還，而大屠殺後所殘存下來的人是否要遣返中國，也需考慮。他認為即使拋開「正義」（justice）不說，開罪中國這樣的大國，而其地方首長已經威脅：若得不到滿意的結果將造一千艘船隻來攻擊馬尼拉，後果將不堪設想。⁵⁴他將「千艘竝出」這句話直截了當地認定是若不滿足中國官方的要求，福建當局將會製造一千艘戰船來進攻馬尼拉，那將是個天大的災難！

馬尼拉大主教向總辦事處呈遞第一件備忘錄的時間是1605年6月10日，相當於萬曆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按、巡撫與太監的來信分別押上同年二月十二、十六、二十二日的日期。在福建寫信的日期與在馬尼拉被處理的時間，相去約六十餘日（兩個多月），雖然不能說

53 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撫處呂宋）〉，《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聯圖書，1964），433/4a - 7a。

54 Benavides de Miguel大主教的備忘錄收在Blair and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V, p. 38 ff. 1606年Serrville出版的小冊子說是100艘戰船而不是1,000艘。不過，徐學聚的原信的確說是「千艘竝出」。

快，考慮到船期與行船的時間，大致上也還合理。⁵⁵

大主教Benavides de Miguel在1605年時，其實與總督Acuña早已處在對立狀態。在不到一個月後，Acuña就寫信回西班牙向國王菲律賓二世（Felip II）控訴大主教的種種不當行為。⁵⁶而這位大主教則在數日之後，在1605年7月26日這天也去世了。

不管馬尼拉西班牙人政、教兩方面的領袖如何相處。既然中國官方正式來信指責大屠殺事件，並且要求返還財物與送回倖免於難的人口一事，畢竟不可忽視。於是總督Acuña也正式寫了一信，送往福建。這封信件，轉譯成英文之後，目前也收錄在*The Philippine Islands*⁵⁷裏。Morga的新譯者J. S. Cummins特別加註提到Pedro de Acuña的回信內容，與他正在回覆的來信，也就是福建巡撫等人的來信，一樣地粗暴無禮（arrogant）。⁵⁸

總督Pedro de Acuña答覆福建當局的信件十分冗長，幾乎針對福建巡按等人的來信逐項回覆或辯駁，可謂鉅細靡遺，一點也沒有遺漏。不過本文的重點在討論李旦，因此先拋開其他內容不談，只談一下他對中國方面還錢、放人兩項要求的回應。

關於財物的一事，無可置疑地，西班牙人趁火打劫，自然將華人財產據為己有了。不止如此，1606年的小冊子還提到：

日本人與邦板牙人（Pampangas）⁵⁹都分到戰利品當中的一份，而那是一份巨大的財富，因為它主要是由金子、銀子、銀幣和珍珠構成的。

55 依十九世紀初，江蘇人葉羌鏞所著的《呂宋記略》一書，廈門到馬尼拉的航程為七十二更，快則七天，最慢一個月一定會到。見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第六冊（臺北：廣文，1964），p. 3a。參考尹士儂纂修、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p. 107。

56 相關文件收在Blair and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V, pp. 29 - 38.

57 Blair and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V, pp. 44 - 50.

58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 231, note 1.

59 當時日本與馬尼拉之間存在著「朱印船貿易」，馬尼拉因此有一千多名日本人居住，而其中有若干成員被西班牙人徵召參與鎮壓華人的行動；邦板牙人為住在馬尼拉以北的呂宋島土著，西班牙人經常徵調他們當兵，也是大屠殺的主力之一。

也就是說，光是站在西班牙人一方的菲律賓土著與日本人都分到大量的金銀珠寶，至於西班牙人當然就不用說了。

總督Pedro de Acuña在當年（1605）先送還了一些財物給死難者在中國的親屬，並且聲明次年會返還剩餘的財產。他在次年（1606）是否履行承諾，目前尚未找到證據。至於確已送返中國的財物下落如何呢？張燮，《東西洋考》卷五〈東洋列國考〉「呂宋」條云：

後夷酋下令招撫。其所掠華人貨，悉封識貯庫中，移書閩當事，俾諸戚屬往領。明年（1604），賈舶乃稍稍去。奸商黃某者，與酋善，輒冒領他貨，稱為某子甲姻黨，網載乾沒云。⁶⁰

張燮本人為漳州府龍溪縣人，龍溪與月港所在的海澄為鄰縣。⁶¹以上的記錄代表著地方上的公論。不過，雖然大屠殺事件發生後沒幾個月（1604年春、夏間）已經有中國船前往馬尼拉，依以上的論述，要到1605年（不是1604年）才有第一批的財物被領回。至於張燮於文字中指控的「奸商黃某」，無疑就是馬尼拉總督Pedro de Acuña致福建巡撫徐學聚的信中，劈頭就提到的“Captain Juan San”，“Juan”以西班牙語讀之，與「黃」相當接近。這位黃某也是受官方之託，替福建巡撫、巡按及收稅太監帶信來給馬尼拉總督及大主教的那個人。在十七世紀開頭福建的涉外事務中，頗具角色。⁶²

至於劫後餘生的華人呢？在總督Pedro de Acuña「粗暴無禮的」回信中，只提到適當時間會將他們釋放。1606年的小冊子“The Sangley Insurrection of 1603”也說明了中國方面要求為返還被取走的華人財產，並送回依舊存活的人。財產的部份，該文獻沒有提到如何處理，至於中國方面要求釋放被打入排櫓船（galleys）的人員一事，

60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五，〈呂宋〉條，pp. 92 - 93。

61 龍溪與海澄現在合併為龍海縣。

62 此需要另文考證，當俟來日。1606年在Seville出版的“The Sangley Insurrection of 1603”一文提到總督Acuña給福建當局的回信就是交給這個人帶去的：“This letter was given to a Sangley, one Juan de San, a prominent man among them, and very wealthy, who had lived many years among us, that he might give it to the eunuch.”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V.)

則說是總督拒絕送走華人（The governor … refused to send the Sangleys）。⁶³

該小冊子所描述的內容則與Morga的說法稍有出入。在1609年出版的*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一書中，Antonio de Morga做了如下的敘述：

他（總督Pedro de Acuña）說，那些他們遺留在馬尼拉的財產，將會返還給所有者；至於那些被囚禁在排櫓船裏的人，則將在適當的時候釋放。不過，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們來從事他刻下正在預備中的摩鹿加遠征。⁶⁴

據此，總督Pedro de Acuña答應將來會釋放那些被送進排櫓船工作的華人，不過還得等他驅使這些人划船征討摩鹿加回來之後再加以落實。

如果李旦正是1603年大屠殺那200名（或者更多一點）子遺者之一，那麼他在1605年時並沒有被釋放。他還得等。

總督Acuña在1606年3月15日出發去征討摩鹿加，同年5月31日凱旋回到馬尼拉。⁶⁵如果他信守承諾，那麼，可能包括李旦在內的1603年事件的子遺者是否就被釋放了呢？遺憾地是，我們連答案都找不到。總督Acuña回到馬尼拉之後，就忙於處理事務，特別是安排每年一次的派遣「大帆船」（galleons）前赴墨西哥的工作。更不巧的是，百忙之中，他卻突然病倒，而且藥石罔效。6月24日，天主教的「聖若望日」（St John's day）這天，他就過世了。總辦事處（Audiencia）暫時接管了總督的工作。⁶⁶可是有關的記載都沒有提到釋走排櫓船上的划槳手這樣的事情。瞭解排櫓船划槳手工作的人應該知道，那是一項費力而且

63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V.

64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V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p. 230 - 231.

65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V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 239.

66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V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p. 240 - 241.

隨時被監督者虐待的工作，划槳手的存活時間往往只有數個月到半年而已，因此能活著被釋放的人數一定少於兩百人；而且李旦必須是這些少數幸運者當中的一員，才有可能在日後移住到日本。

徐學聚在處理這個事件告一段落之後寫了〈報取回呂宋囚商疏〉，當中提到：

議照呂宋通商一節，原因漳、泉濱海居民鮮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漁，乃其生業。往往多至越販諸番，以窺厚利。一行嚴禁，輒便勾倭內訌。嘉靖（1522 - 1566）季年，地方曾受蹂躪之慘。維時當事議以呂宋素不為中國患者題奏。欽依，許販東西二洋，華夷相安，亦有年矣。

顧一旦屠戮逋商至萬計者，變出異常，法應討罪。但究其禍端，良由張嶷妄奏採樵，為之厲階。及姦商前年殺其酋長⁶⁷，積怨蓄憾，有以激之，情似可原。矧提師渡海遠征，勝負難料，國體攸關，何敢輕率啟釁，以塵皇上南顧之憂。

臣隨會檄，傳諭佛郎機國酋長呂宋部落知道：【如前引】等因，去後。

今據前因，除取回商民，批行該道查審明白，發令各家屬領回安插外。

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湯兆京看得：呂宋原禁商民、併劫去財貨，遵照傳檄，悉經放還。詳閱來文，詞甚恭謹，皆仰藉皇上之寵靈，得以保商民之生命，且不至煩兵費餉，坐令懷德畏威，實得柔遠固圉一策。即臣仰荷天語責成至意，亦可少抒其萬一矣。⁶⁸

徐學聚的巡撫一直當到萬曆三十五年（1607），此份奏疏雖無日期，但必然是三十三年（1605）中國貿易船從馬尼拉回到福建以後。

67 指萬曆二十一年（1593）華商潘和五等人，因被安排到排櫓船划船，隨總督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出征美洛居（摩鹿加），出發後不久即將總督殺害，劫船而逃的事件。簡單的過程可參考張燮，《東西洋考》卷五〈東洋列國考〉「呂宋」條。

68 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433/4a - 7a。

可是三十三年時，只有部份財物被返還；人員最快應該在1606年（萬曆三十四年）6月以後才可能回到中國，而他也才能和巡按湯兆京一起向皇帝報告說「呂宋原禁商民、併劫去財貨，遵照傳檄，悉經放還。」
「發令各家屬領回安插」。

由於種種的耽擱，1603年的劫後餘生者，大概要到1606 - 1607年間才被釋放。李旦有可能是當中的一員。在被釋放之後，他大概不能忍受繼續待在馬尼拉，也沒有回中國定居，而在1607年左右前往日本投靠其（義）兄弟歐華宇（Whaw）。

（三）馬尼拉的華人客長

李旦告訴Richard Cocks說他原是富商，有家產值四萬兩銀子，因西班牙人覬覦他的財產而將他關到排櫓船內，後來再行逃走。這樣的敘述顯然是避重就輕，為自己保留顏面，甚至於往自己臉上貼金。但攏總地說，也不算離開事實太遠。至於李旦自稱是“Governor of the Chinese at Manila”，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吹噓。不過，以他的後期活動所見的人格特質逆推，他應該是位具有領袖魅力（charisma）的人，因此有可能成為旅居馬尼拉的華人首領之一。但是他是怎樣性質的一位華人首領呢？

他不是當時當地全體華人的領袖，因為事實上已有其人。1603年10月華人起事之初，就有一位華人，取名Joan Bautista de Vera，向西班牙人告密。Morga的書上說：

據信此一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一個天主教徒華人，一個有錢人，在當地居住多年，名叫Joan Bautista de Vera，他深受西班牙人敬重，而為華人所敬畏。他曾經數度成為華人「客長」（governor），擁有不少的「教子」⁶⁹與仰賴他為生的人。”⁷⁰

69 西班牙人及天主教道明會的教士們，為了緊密控制華人起見，鼓勵發展教父——教子的關係來打破華人既有的血緣及地緣網絡。參考Christine Dobbin, *Asian Entrepreneurial Minorities: Conjoint Communities in the Making of the World-Economy, 1570 - 1940* (Richmond, Surrey, U.K.: Curzon Press, 1996), ch. II, “Manila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Chinese Identity 1570 - 1830,” pp. 20 - 45.

70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V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 219.

據1606年出版的小冊子，此文件描述事情發生的經過，說先是在1603年9月26日，有一名女黑人聲稱在「聖法蘭西斯日」（St Francis' day，10月4日）那天會發生大火及流血事件。西班牙人著手調查，但一直沒有收獲。到了10月3日，也就是「聖法蘭西斯日」的前一天，果然有人發現大約有三百名華人集結。不久之後，

……來了一名天主教徒華人，一位Baristilla，當時為不分天主教或異教的所有華人的「客長」（governor），他狡猾地通知Pedro de Acuña先生那個消息，還受到真心誠意的感謝，因為實情尚未為人知曉。

在Miguel Rodriguez Maldonado編輯的小冊子中，這位叫作Baristilla的華人天主教徒，顯然就是上面所提到的Joan Bautista de Vera。但他很快地，他就被當成是該次動亂的禍首，連同另外兩位華人首領，隨即便被西班牙人指控，不久都被處死。Miguel的小冊子接下來把這位華人客長的名字又拼成「Bautistilla」，說：

眾人都指控Bautistilla，一名天主教徒，如前所述，他是他們〔華人〕的客長（governor），認定他是動亂的原因，說他曾被立為萬國之王。眾人也指控Miguel Onite與Alonso Sagoyo——這兩個人都是天主教徒，也是他們的首領（“chiefest men”）。在聽取他們的證言，與透過充分的蒐證後，加之眾人都歸罪於Bautistilla，因此就判這個人絞刑並加以肢解，並將他的頭顱擺到「八連」（*parian*）⁷¹。他被宣告為叛徒，以國王的名義將其財產充公。他的房舍全都犁平，並在現址灑鹽。此一判決由王家總辦事處處理，並在10月11日執行。

71 「八連」是西班牙人從1582年起在馬尼拉城以東，緊貼著城牆的處所所建立的一個華人集中活動區域。有關「八連」的研究文獻頗為不少，但仍以前引箭內健次，〈マニラの所謂パリアンに就いて〉一文最文詳盡。不過，對為何叫作「八連」（*parian*），學術界迄今尚無共識。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他的新書《維梅爾的帽子》（黃中憲譯；臺北：遠流，2009），p. 197說“*parian*”是馬尼拉當地的「他加祿」（按、即Tagalog，一譯「大家樂」）語，意為「討價還價（*pali*）的地方（*an*）」。說法頗為新奇。但因為缺乏必要資訊，無從判斷他的說法是否可取。聊記於此，以備一說。

在絞刑架下時，他說他的行為不該受此一死，他一向都是〔西班牙〕國王的忠誠屬下；上帝知道他胸腔內為何物，也知道他心裏怎麼想。他死時帶著良善天主教徒該有的特質。接下來，在同月15日，那〔另外〕兩名華人也被處死。

據說這名Joan Bautista de Vera的中文名字讀起來是「Eng Kang」。⁷²此外，在*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IV當中，也有一條註，提到尚有一份未出版、也未收到整套書中的西班牙史料，同樣記錄此次大屠殺事件，其中對這位被指控的華人首領有所記載。

該項史料即耶穌會士Gregorio Lopez, S. J. 一封押署1604年4月的信件，內容大同小異，但在追殺華人的細節上描述得更加仔細。他把那位被懷疑而遭到處死、肢解的華人名字拼作Juan Bautista de Bera (Vera)，並且說他的凡俗名字讀音為「Hincan」。此人打從林鳳 (Limahon) 的時候 (1574 - 1575) 就已經住在馬尼拉了。⁷³無論Joan Bautista de Vera在他的華人同伴中是被稱作「Eng Kang」還是「Hincan」，當然都不會是李旦本人。另外兩位也被處死的華人首領 (chiefest men)，Miguel Onite和Alonso Sagoyo，也不會是李旦，因為他們三個人都被西班牙人處死了。

若照Morga所追述的1603年前夕馬尼拉華人社會的概況⁷⁴，到當地謀生的商販及工匠原則上都住到稱為「八連」(Parian)的所在，要開店也開在那裏面。他們由自己人擔任「里長」(*alcayde*)⁷⁵，他擁有自己的公堂、監獄與執事人員以處理公事，照顧居民的安全並維護八連內的秩序。想在馬尼拉待下來的華人若是無法在八連找到房子，那就住到巴什河 (Pasig River) 對岸的Tondo區內的Baibai與Binondo兩個

72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 219, 原註2提到他就是Eng Kang, 以及有關他的其他研究與報導; p. 220提到他的被捕與在1603年10月11日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庚申日) 被處死之事。

73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14, note 26.

74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V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p. 315 - 317.

75 Cummins說是 "municipal judge, magistrate, or mayor." 見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 xi.

里，歸Tondo區長（*alcalde-mayor*）⁷⁶治理。⁷⁷不過，Morga接著又說：

他們擁有一位屬於他們自己族群的「客長」（governor），為一名天主教徒，手下有幾位職司協助他審理屬於內部事務或商業事務的法律案件。不接受他的判決，則可以向Tondo區長或八連〔里長〕上訴，而最後的出路則是向總辦事處尋求救濟——後者對華人以及一切與華人有關的事情都特別用心。⁷⁸

顯然八連里長與Tondo區長都具有官方的性質，而華人「客長」才是自治性質的首領。箭內健次也參考了Morga的報導，主張在1603年前後，不分是否為天主教徒，華人的客長（governor）似乎只有一位，而且係自行產生，並不由西班牙人任命。⁷⁹事實大致也如此。不過，小股華人的頭領，想來不會只有一位吧。例如1590年初，號稱是馬尼拉「華人領袖」者就不止兩位。⁸⁰而前面提到與Joan Bautista de Vera一道被指控，稍後也被處死的Miguel Onite與Alonso Sagoyo兩人，不也都被說成是當地華人的首領（“chiefest men”）嗎！因此，李旦若是馬尼拉華人的頭領，也應該只是小股華人頭領當中的一位吧。

三、結語

李旦是不是1603年大屠殺倖存者？以上的研究其實無法確切地加以證明，但周邊的證據相當吻合。他說他曾被關到排櫓船內服役、1607年左右從馬尼拉到達日本，這確實與大屠殺事件的後續的事態發

76 Cummins說是“the governor of a province.”，同上註。

77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p. 315 - 316.

78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 Cummins), p. 317.

79 箭內健次，〈マニラの所謂パリアンに就いて〉，pp. 279 - 283。

80 參考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p. 58。

展若合符節。至於他跑到日本，說西班牙人是為了謀奪他的財產才與他展開鬥爭，這句話說得很含糊。即便他是小股華人的首領，西班牙人要剝奪他個人的自由或剝奪他的財產，應該也不會是難事，不需要「鬥爭」。他的說法，除了自我膨脹之外，如果說成是西班牙人為了謀奪華人的財產，因此對全體華人展開鬥爭，而 he 自己是華人的眾多領袖之一……云云，大概就可以合理化了。他當時（1616年左右）將房子租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很想承攬英國人的生意，吹噓自己曾經擁有價值四萬兩銀子的財產，多少也可提高英國人對他的評價。⁸¹

李旦又說他在馬尼拉曾經是華人首領，多少應該也是事實，因為當時日本的「朱印船」往來馬尼拉的的確不少，吹噓過頭想必會被戳破。另一方面，據英國人的資料所記，他的（義）兄弟歐華宇（Whaw）早就是長崎的華人領袖，透過歐華宇的影響力，他也成為平戶當地華人的領袖，因此被喚作“Captain China”，這也接近事實。而他顯然工於心計，頗有能力，確實也是一方之雄。等到1620年歐華宇死後，李旦就自然成為全體旅日華人的領袖了。有關他到達日本一直到他於1625年死亡前的活動，研究已多，但與本文之目的無關，暫不細論。

81 《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p. 127。

Title

On the Manila Massacre and Li Tan's Escape to Japan:
A Conjecture, 1603-1607

Kuo-tung Ch'en,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on Li Tan must be Iwao Seiichi's works. However, he misreads a short part of his materials. After re-inspecting that source, we are enabled to establish the date of Li Tan's migration to Japan to the year of 1607. Four years before, an unmerciful killing had happened in Manila, where the Spanish killed about 25,000 Chinese. Of the local Chinese residents only some two hundred souls survived but were sentenced to the galleys as rowers. At the much delayed instance of the Chinese officials from their home country, those rowers were finally released in 1606. It is likely that Li Tan was one of those fortunate guys, and he moved to Japan permanently not long after his release.

Key-words : Lin Tan (Andrea Dittis) Manila Massacre
Governor of Manila Governor of Fujian
Governor of the Chinese